

1941,中国首次日全食观测在临洮

□ 张育麟

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科学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从云南昆明出发,经贵州、重庆、四川、陕西抵达甘肃临洮,历时42天行程3200公里,圆满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在世界天文史、航空史、科技史、电影史上创造了四个第一次。

1934年岁末,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带进入我国新疆,经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在福建北部入海,经过4000公里112个县。

不久,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中国天文工作者观测的日全食,是继中国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21日日全食之后,近400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日全食,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

在人工日冕仪还未发明前,由于太阳周围的天体被它明亮的强光掩盖了,科学家无法观测和分析太阳及其周围的空间。而日全食发生时,平时难得一见的太阳色球层和日冕层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给天文学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通过观测和研究,可以了解太阳大气的组成、温度、结构以及太阳的活动规律。更重要的一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以后,尽管英国科学家爱丁顿通过观测日全食,证明了爱丁顿观点的正确性,但仍有不少科学家对爱丁顿的观测结果持怀疑态度,打算再次验证。因此,1941年的日全食观测就显得十分重要。

1939年3月16日,日全食筹备工作正式启动。这时,日寇加紧了太平洋战争步伐,世界各国纷纷取消了来华观测的计划。观测400年来罕见的日全食并留下科学记录的任务就全压在中国科学家的肩上。

科学观测最重要的是观测所需的仪器。不久,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从美国订购的地平镜,刚刚运到香港就被日机炸毁。此时,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调到中央研究院任职,天文研究所所长职务由张钰哲接任,他在惋惜中不得不佩服

余青松独到的眼光。从南京西迁昆明时余青松所长让大家运来了笨重的仪器,然后根据美国菲克公司的样图,余所长亲自绘了一套施工图,由张钰哲负责在云南五金工厂铸造了一个铁架,一个安装齿轮的底盘,用南京运来的仪器拼凑了一架天文镜,一架地平镜。此时,这套拼装的观测仪便成为唯一的希望,但原定在甘肃天水 and 陕西安康两地观测的计划却落空了。经过权衡,最终将观测地点选择在距离兰州100公里的临洮县。

1941年6月7日,“西北日食观测队”在昆明凤凰山天文台成立。观测队员由10人组成。张钰哲任观测队队长,陈遵妫为总干事长。

从昆明到临洮,路途遥远,运费和汽油极其昂贵。在抗战最艰苦的情况下,要将弥足珍贵的汽油用来观测日食,许多人觉得不够现实。然而,几天后张钰哲却意外地收到批复:(一)已定预算若超支可以追加;(二)汽车由军令部和甘肃油矿局免费提供。

6月30日,旭日东升,观测队员们登上一辆装有观测仪器的道奇牌军用卡车,从昆明出发,经贵州、重庆、成都、天水,去往兰州。

旅途中的困难是难以预料的。火车还未到曲靖,麻烦就来了。由于天气转晴,日机便接踵而至,铁路被炸毁,幸好观测设备完好无损。次日清晨抵达曲靖后,他们又将设备行李转移到汽车上。

广袤的云南高原,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不仅紫外线强,而且多为崇山峻岭,崎岖山路。这对来自低海拔地区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莫大的考验。一直致力于研究那次日全食观测的同济大学教授赵惠康说:“往山下看,有不少的汽车翻到深沟、山崖下,这不光是心灵的恐惧。”

离开云南富源县不久,就进入贵州境内。在前往贵阳途中,观测队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后来他们干脆不分昼夜,只要听到警报就隐蔽,没有警报就赶路。就这样,大家汽车当房,行李当床,一路风尘,终于翻过了娄山关。

翻过娄山关,观测队经黎平前往重庆。重庆

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在重庆南郊的海棠溪,观测队遇到了27架日机的轰炸。大家纷纷躲在桥洞下,汽车藏在树林中。半个小时后敌机离开了,留下的是老百姓痛苦的呻吟和哭喊。

7月20日清晨,观测队在细雨蒙蒙中离开成都,经德阳、绵阳、江油,前往剑阁。盛唐时期,李白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然而,对于经历过一路艰险的观测队员来说,已算不得什么。

越过剑门关,经过广元,跨过棋盘岭就进入陕西西地界了。观测队员根据《陕西省地图》的指引,经宁强、勉县、褒城,走完了陕西省。陕西勉县,是观测队这次逐日临洮中最难熬的一段路。勉县位于汉中盆地西端,北依秦岭,南靠巴山,居川、陕、甘要冲。此时的黄沙镇,虽然没有战火,但却弥漫着一股荒凉和恐惧。

那天,观测队吃过晚饭,就连夜出发了。谁知这段漫长的黄沙路没有烟火,漆黑荒凉的路边不时地出现狼群。队员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所幸的是,狼群没有攻击的意向。队员们在狼嚎声中战战兢兢,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摇晃,缓缓前行。

就在距褒城十五公里的时候,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接着一声巨响,随后便是巨大的雨点,然后是倾盆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是祸不单行!队员们在大雨中熬过了半个小时。虽然雨停了,但汽车却不走了!无论司机怎样努力,马达却始终发动不起。大家跳下车去推,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汽车推出泥潭。

张钰哲环顾四周,除了田野、树木,没有一户人家。他当即决定:留下两人和司机守车,其他人往前走,设法找人帮忙。身着湿漉漉的衣服,踩着粘糊糊的泥泞,走了一里多路,终于发现了一座天主教堂。深更半夜,意大利神父突然见到几位狼狈的不速之客,着实大吃一惊。但他很快明白了,于是点燃火炉,叫来司机,烤干衣服。

(连载一)



衙前村农民协会旧址

1921年4月,早期中共党员沈定一,回到老家浙江萧山县衙前村,组织、发动农民革命斗争。当时,萧山农村百姓饱受军阀骚扰、地主压榨和苛捐杂税的重负,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度日。

沈定一回来后,通过教人读书识字、入户走访、聚众谈天等方式,宣传农民为什么当牛马、受苦累,却吃不饱穿不暖;地主为什么不种田、不劳动,却享受荣华富贵……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捐抗税、减租减息,争取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

倍受启发的贫苦百姓,压抑多年的愤怒如火山般喷发出来,在沈定一的指导下,进步农民李成虎、陈晋生、金如涛等人走家串户联系,商议、策划如何与地主开展斗争。

1921年9月27日,在沈定一的指导下,李成虎等人召集衙前村200多名贫苦百姓集会,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组建、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大会发布了沈定一起草的《农民协会宣言》和《农民协会章程》,指出:“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等。

这两篇中国农民首次宣布自己政治主张、奋斗目标、社会地位以及权益、责任、义务细则的重要文献,在早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1921年第11卷全文刊载。

众人推举李成虎任农民协会会长,陈晋生、金如涛为副会长,他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向地主宣布租种户将“三折还租”,并没收了地主称粮用的“斗”。原来,地主家的粮食都是大斗入、小斗出,一进一出就能剥得4斤多粮食。穷苦农民虽明知吃亏,却敢怒不敢言,许多地主家每年有万余斗粮食进出,盘剥所得十分巨大。

李成虎带人当众砸毁了大、小斗,勒令地主今后必须使用标准的斗。接着,沈定一、李成虎领导农民协会开展一系列斗争:流经衙前村的西小江盛产鱼虾,但捕鱼权却被豪绅把持。李成虎率100多人到县公署展开说理斗争:“西小江是公河,为啥不准老百姓捕鱼?”县知事怕惹起众怒,只得签发允许农民在西小江捕捞的告示。

同年11月,地主与粮商哄抬米价,百余名断炊的老百姓在农民协会召集下,赶往县城开展斗争。进城途经的村镇,饥民们纷纷追随,队伍竟扩大到1千多人,浩浩荡荡闯入县城。米店老板闻讯吓得战战兢兢,纷纷恢复了原来的米价。

农民协会斗争取得的胜利,很快影响到周边地区,短短两个月,萧山、绍兴、上虞等县有80多个村相继建起农民协会,10多万贫苦农民投身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减租减息”等斗争。

广大农民空前团结,农会组织不断扩大,减租斗争持续深入,引起反动当局的惶恐不安,军阀政府调派大批警察,镇压萧山、绍兴等地的农民运动,查封农民协会。李成虎等农会领导人被捕,惨遭毒手。

李成虎的英勇牺牲,得到社会各界同情,1922年1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李成虎小传”纪念文章。同年2月22日,上海“工商友谊会”的代表来衙前村凭吊李成虎,并出资筑建墓碑,上镌“精神不死”。

衙前村“农民协会”虽仅存在了4个月,但它所领导、引发的革命斗争,开启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序幕,它提出的行动纲领,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为广大农民闹翻身、求解放指明了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首次尝试,彰显出中国农民伟大的抗争精神、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 周铁钧

珍赏

五子齐登科 丹桂五枝芳

□ 李笙清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46岁的孟郊在两试进士落第后,奉母命第三次进京应试,这回终于科场高中,进士登第。回想起历年来寒窗苦读,两次名落孙山,而今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不禁感怀万千,挥毫写下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将自己科举高中欣喜若狂的情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准则,以至于天下学子发奋读书,力图跻身于科场之间,将科举视为改变命运、鱼跃龙门的最佳途径,即使屡试屡败亦毫不气馁,哪怕皓首也要读书不倦,而一旦进士及第,无异于“荣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份尊贵,光耀门楣。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50多岁还是童生,读书读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借钱赶考始中举人,从此辉煌腾达,改变了人生的命运。“只把文章谒帝居,便从平地跃空虚。分明有个上天路,何事儿孙不读书。”这首宋代许载的《及第后寄宜春亲友》诗,可谓古人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心灵写照。由此,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生活用品及艺术品上,如书画、瓷器、玉器、竹雕、瓷板画、文房用具等等,“登科”可谓一大极有特色的题材。

明“五子登科”铭文镜(附图),圆形,圆钮,素缘。镜钮区处于一周弦纹内,沿镜钮又一圈柱状

纹,有应考得中的“折桂”寓意。外区处于内外弦纹之间,呈对称形式分布有四个凸起的方框,框内分别楷书一字,组合起来就是“五子登科”四字,“五”“子”上下对称,“登”“科”左右相对,字体端庄厚实,遒劲而又不过秀美。方框之间,分别以双雁和两朵牡丹花隔开,呈上下、左右对称分布,大雁呈飞翔状,牡丹枝叶繁茂,花朵盛开,有功名富贵寓意。整件器物除了局部有锈蚀,基本上保存完整完好,包装丰厚,纹饰简单明了,充满吉祥寓意。

登科,也称“登第”,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因榜上提名有甲乙次第,故又称“及第”。隋唐时期只用于考中进士,明清时期,殿试之一甲三名称赐进士及第,亦省称及第,另外也分别有状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的称谓。应试未中的则称“落第”“下第”。“五子登科”四字的出现,与五代后周时期寒燕山教子有方、五子成才的典故有关,《三字经》中的“寒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就是这件事。寒燕山,原名寒禹均,五代后周时期人,因世居燕山一带而被称为寒燕山。据说寒燕山有五个儿子,分别取名奕奕、奕伊、奕侃、奕儒、奕信。寒燕山学识渊博,以词学尤为著名,自幼就开始精心培养五个儿子,建书房40间,买书数千卷,建义塾,延请名士大儒为师授业,对于穷苦之家的学子则免费入学,造就了一些人才。对五个儿子,无论



是学习还是品德修养,寒燕山都格外用心,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五个儿子发奋勤学,聪颖过人,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考取功名,其长子奕侃官至工部尚书,次子奕伊官至翰林学士,其余诸子皆功成名就,为官经年,八个孙子也个个出类拔萃,寒燕山自己亦官运亨通,做到谏议大夫之职,祖孙贵显,显赫一时。对此,当时的侍郎冯道曾赋诗一首赠给寒燕山,对寒燕山教子有方、五子登科给予高度评价。诗曰:“燕山奕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其中的“丹桂五枝芳”即喻指寒家五子折桂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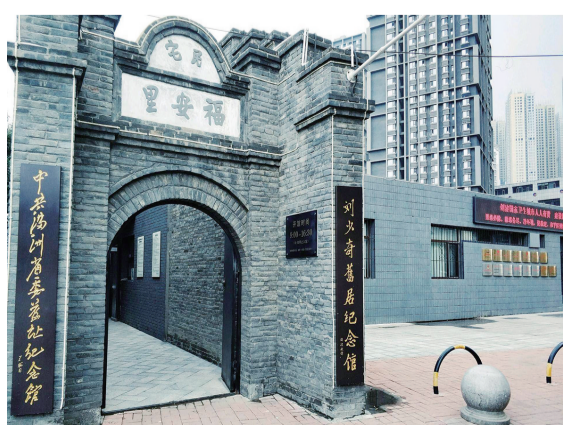
这枚铜镜以“五子登科”的故事为题材,在诠释古人教育育人的同时,体现了古人盼子成龙的殷殷期望,亦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心理。明代正是科举空前繁盛的时期,寒燕山教子有方“五子登科”的典故被作为一种鞭策人们勤学上进的精神食粮,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工匠以之为题材纹饰铸造铜镜,人们则以这种铜镜相互赠送,表达了赠送者对受赠者的美好祝愿。

红色记忆

火炬,点亮在白山黑水间

——参观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 钱国宏



沈阳市老城区中心,在喧嚣闹市的一处僻静之巷——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现出一处古朴庄重的青灰色建筑,与周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栋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便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革命时期建立的统一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和党务工作的机关——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旧址纪念馆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主要由福安里门楼、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刘少奇旧居、中共满洲省委历史陈列厅、宣誓广场等组成。

刘少奇旧居按原貌重建于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的北院。室内采用了复原陈列形式,东侧间为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的卧室,次间为会客厅,里面为厨房。

旧址南院为中共满洲省委历史陈列厅。陈列厅展陈以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发展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为脉络,系统而全面地展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光辉历程。展览分为九部分,展出图片500余张、文物展品300余件。同时也展出了“刘少奇与东北”的展览,此部分分为4个部分:刘少奇与中共满洲省委、刘少奇与东北抗战、刘少奇与东北解放、刘少奇视察林区。展览通过近20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生动地再现了刘少奇为东北地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历史功勋及其光辉品格和风范情操。

的斗争,奉天(沈阳)兵工厂的反日斗争、广大农村的佃农斗争、哈尔滨“一一·九”学生运动……东北广大地区一度陷入低潮的革命形势开始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接续组织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白区和沦陷区工作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白区和沦陷区工作路线提供了重要借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打响了抵御外侮的第一枪。中共满洲省委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和积极应对,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许多骨干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并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接续组织的领导下,以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为基干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坚持了长达14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满洲省委工作。党的杰出领导干部陈为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林仲丹、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等,他们在领导满洲省委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为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